

回顾与思考

REVIEW AND THINK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30年

张贤明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社

回顾与思考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30 年

张贤明 主编

 世界
W A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顾与思考: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30 年/张贤明主编.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7-5012-5582-5

I. ①回… II. ①张… III. ①政治学—研究—中国
IV. ①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7507 号

责任编辑 刘豫徽
责任出版 王勇刚
责任校对 陈可望

书 名 回顾与思考: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30 年
Huigu yu Sikao: Zhengzhixue Lilun yu Fangfa 30 Nian
主 编 张贤明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网 址 www. ishizhi. cn
投稿信箱 lyhbbs@ 163. com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20×1020 毫米 1/16 24³/₄印张
字 数 352 千字
版次印次 2017 年 10 月第一版 2017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582-5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30 年	张贤明 薛洪生	1
一、发展历程		2
二、主要成果		27
三、发展趋势		55

政治学恢复以来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演变考

.....	师泽生 亢 光	81
一、在对待政治学方法的态度上，由轻视到中立 再到注重价值的转变		82
二、在方法论的角度观察和分析，由非此即彼到综合运用 再到结构型建构		85
三、在价值判断上，由工具性到评价性再到知识性的提升		88
四、在关于政治学方法的地位上，由依附到独立 再到系统性的确立		91
五、在方法研究重点的选择上，由介绍到建设 再到批判性发展		95
六、在方法研究的层次上，由宏观层次独占鳌头到微观研究 日渐丰富再到多层次研究的初步形成		98
七、在方法论研究的内容上，从二分到复合再到多元化的过渡		100

八、在方法的研究数量上，由基本忽视到综合概括 再到专题性研究的拓展	103
中国政治文化理论 30 年	王 浩 106
一、前言	106
二、中国政治文化理论发展 30 年的历史回顾	109
三、30 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的特点	124
四、中国政治文化理论研究不断深入的必然要求	131
五、结论	13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综述	林 毅 139
一、中国政治发展理论 30 年发展历史回顾	140
二、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特点	208
三、结语	211
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核心政治价值的精髓	虞崇胜 213
一、之所以说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核心政治价值的精髓， 是因为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普遍原则， 无论什么政治形态都必须遵循	213
二、之所以说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核心政治价值的精髓， 是因为公平正义最能反映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 政治价值的本质	217
三、之所以说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核心政治价值的精髓， 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较之其他社会制度能够 更好地实现公平正义	220
四、之所以说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核心政治价值的精髓， 是因为坚持公平正义原则能够较好地解决个人 与社会关系的难题	224

国家能力认知的历史向度	何 颖 霍建国	230
一、国家权力向度中的国家能力		231
二、国家职能向度中的国家能力		235
三、国家治理向度中的国家能力		238
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研究的新视野	刘雪莲 徐立恒	241
一、区域研究——地缘政治研究的新领域		242
二、非传统安全的地缘性		243
三、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地缘政治研究		245
四、地缘政治研究的增量空间		247
政治正义：政治文明的价值之维	何俊武	250
一、概念界定：政治正义与公共秩序		250
二、理论解析：政治正义对政治文明的重要价值		251
三、现实思考：实现政治正义、建设政治文明的路径		257
在焦灼中前行		
——中国政治学的十年反思	李德满	261
一、发展历程的解释		263
二、实践性与学术性		267
三、本土化与国际化		272
四、科学化与规范化		277
五、“焦灼”及其背后		281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内在张力与理论取向	马雪松	285
一、新制度主义分析层次上的分歧：能动与结构		286
二、新制度主义研究途径上的分歧：解释与诠释		289

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取向	292
地区概念的引入与地缘政治学的中观层次研究的加强	
..... 于海洋	298
一、地缘政治学海陆两极理论的解释力缺陷	298
二、地缘政治区：地缘政治解释力的新来源	301
三、地区间：争议中的分析层次	305
四、地区的发展：走向全球地缘政治之路	308
现代国家的理论变迁与国家建设	陈毅 311
一	311
二	315
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选择及应用	周忠丽 325
一、个案研究方法及其特征意义	326
二、个案的类型与选择	328
三、比较个案研究的局限与研究方法的超越	333
四、结语	335
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 30 年发展的回顾与思考	彭斌 337
一	337
二	344
类型学与比较政治理论建构：	
以利普哈特的“共识民主”理论为例	邢瑞磊 353
一、比较研究的一般路径与类型学分析	355
二、类型学方法的典范：利普哈特“共识民主”理论	361
三、小结	371

评析传统地缘政治学对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依附性

.....	张微微	372
一、冲突性的地缘政治观：地缘政治学的主导观念		373
二、冲突性观念下的理论对现实主义哲学的依附性		376
三、依附于权力政治哲学的消极后果		383
四、结论		385

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30 年

张贤明 薛洪生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的著名命题，对于政治生活的需要伴随着人的始终。而作为把握人类政治生活基本规律，阐释人类政治生活本质，“研究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社会主要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的科学”，^①政治学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1980 年中国政治学会的成立是政治学在当代中国得以复兴的标志性事件，自此之后，中国政治学研究在学界同仁的不懈努力下日益成熟，并不断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滋养和实践动力。欣值中国政治学会成立 30 周年之际，对此期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轨迹进行必要的审视和展望是政治学研究工作者的学术责任。理论与方法是支撑每一学科的两块基石，因此对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对其相关成果进行梳理，对其应然走向进行评测，无异于展现当代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的前世、今生和未来。这对于中国政治学的持续繁荣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① 王惠岩：《王惠岩文集》第 4 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18 页。

一、发展历程

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已有百余年历史。1903 年，京师大学堂首次开设“政治科”。1932 年，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这一时期涌现出王世杰、钱端升、浦薛凤、周鲠生、萧公权、张汇文、张奚若、钱昌照、许德珩等老一代政治学家。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高等教育体制以“苏联模式”为范例，视政治学为“伪科学”并于 1952 年在大学中正式取消了政治学系。^① 政治学在中国作为独立学科消失了将近 30 年。

1979 年邓小平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② 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1980 年 12 月，中国政治学会在北京成立（重建），当代中国政治学的舞台拉开帷幕。重获新生的中国政治学在 30 年的光辉历程中，其理论与方法也不断充实与拓新，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时期。

（一）理论正名和方法奠基时期（1980—1985 年）

由于政治学离开中国人的视野将近 30 年时间所导致的“集体失忆”，加之长期以来对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否定，中国政治学在重建伊始便受到误解。尽管之前的老一代政治学家已经对政治学做过一

^① 参见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东南学术》2000 年第 2 期。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百年回眸》，《人民日报》2000 年 12 月 28 日第 12 版。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80—181 页。

些著述,^①但是,一方面,这些著作大多停留在对政治思想史的叙述和西方政治学说的引介上,较少对中国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而另一方面,时代需要和具体国情的变化也决定了难以用他们的著述去建立当代中国的政治学体系,去指导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发展。此外,在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相继重建了政治学专业和政治学系,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上述现实都迫切地需要厘清政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如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原理等学科的界限,奠定政治学的研究基础,明晰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确立政治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对于当时的中国政治学界而言,面临两大亟需解答的元问题: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政治学?只有在政治学基础理论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前提下回答这两个问题,构筑当代中国的政治学体系才会成为可能。这一时期的政治学研究工作者大多参与到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之中,并由此展开关于政治学的内涵、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等政治学基本理论方面的论述。而对于政治学的方法论问题,当时的中国政治学界一致认同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作为政治学分析的基础性工具。1985年,《政治学研究》发刊,“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获得全面恢复”。^②抛开学术旨趣不谈,更遑论是否对上述两大元问题得出具有共识性的答案,^③当时的中国政

①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高一涵的《政治学纲要》、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钱端升的《中国政府》、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浦薛凤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潮》,等等。

② 张友渔:《中国政治学的兴起——代发刊词》,《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1期。

③ 当时的学者回答“什么是政治”和“什么是政治学”这两个问题的目的并非是统一认识,而是要为政治学在理论上正名,使之名正言顺。而且直到现在,这两个问题恐怕也没有得出令所有人认同的答案,学者们仍然在进行关于政治含义等问题的讨论,因为学术争鸣是学科发展的动力之一。但是这已经属于政治学理论发展和研究需要的范畴,不具有当年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的特殊意义。

治学研究工作者本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进行的学术活动，具有鲜明的理论正名和方法奠基的意味。

“什么是政治”和“什么是政治学”这两大元问题相比，前者是更为根本的问题。因为一旦回答了“什么是政治”，那么“什么是政治学”就顺理成章，昭然若揭了。从理论视角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学界对于政治的含义的表述基本上是以阶级和国家作为逻辑起点，大体上有五种观点：（1）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2）政治是国家活动的表现形式；（3）政治是统治阶级的政策和策略形式；（4）政治的根本内容是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5）政治体现为权力关系。^①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诸多对政治的定义，如“综合说”“经济说”“国家活动说”“一般活动说”“双重性说”“阶级统治说”“决策说”“治人说”“管理活动说”，等等。对于“什么是政治学”而言，明确其研究对象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还是政治，是政治关系抑或政治体系，学界莫衷一是。其中比较得到学界认同的一种观点是把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从广义和狭义的时空二维上进行划分，广义上把一定基础的社会公共权力的活动、关系、形式和发展规律视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狭义上则把国家的活动、关系、形式和发展规律视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②这些理论创设为日后中国政治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出于强烈的历史使命和崇高的价值目标，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学理论中也包含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观照，主要有国家职能再确认问题、废除国家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和“一国两制”问题。

第一，国家职能再确认问题。国家问题作为政治学研究的题中之义，始终占据着政治学理论的核心地位。但是在政治学中断的时段中，国家问题并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和实质的进展。在长期“左”的指导

① 参见许崇德、于浩成、陈为典编著：《什么是政治学》，北京：群众出版社 1985 年版。

② 参见刘瀚、洋龙：《50 年来的中国政治学》，《政治学研究》1999 年第 4 期。

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传统的国家观。这种国家观认为：国家是实施阶级压迫的暴力机器，而这一暴力机器的主要职能就是对内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对外进行侵略或者抵御他国侵略。国家的对内职能是根本的和具有决定性的，国家的对外职能是对内职能的衍生形式。传统的国家观在国家职能方面过分地强调了“专政”，并且使人们忽视了现实的社会发展条件，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就意味着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论断。但是，“无产阶级国家虽然建立了和发展了，但是彻底否定旧国家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同旧国家的‘幽灵’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① 因此，政治学恢复后，学者们除了对国家的起源和消亡、国家的本质和国家的定义进行论述，更为集中地把研究视阈投向关于国家职能再确认的问题上。许多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进行解读后认为，国家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作为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国家还具有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这一国家职能与传统国家观所认定的国家职能是有机统一体，而在国家建设时期，国家的根本职能更多地体现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② 随着对国家职能再确认的讨论不断深入，使得当时的中国政治学界树立了比较一致的信念，即国家的主要职能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相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应当是发展经济、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政府的社会属性使当代政府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公共事务。”^③

第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国际共运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废止干部职务实际上存在

① 李景鹏：《论无产阶级国家对旧国家的否定问题》，《政治学研究》1986年第5期。

② 参见凌陵：《关于国家职能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陈仲化、马润青：《论国家的管理职能》，《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③ 王沪宁：《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趋向（1980—1986）》，《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2期。

的终身制的规定，并将写进党章”。^①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堪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纲领性文献”^② 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两个重要事件直接刺激了当时的中国政治学界对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的研究兴趣并视其为政治民主化的切入点，也为后来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开创了契机。学者们提出一些观点并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1982年，宪法对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一时期的政治学研究工作者的主要观点是：（1）从历史上考察，政治制度上的职务终身制是经济制度上的私有制的孪生物，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职务终身制作为私有制和利益的对立的产物都有其恶性反应，而职务终身制在新中国的实际存在将会带来严重后果，只有废止才是党心所归，人心所向；（2）从现实上考察，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不符合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一政体的要求，不符合干部接班的正常规律，不符合首创精神的要求，不符合人的生理和思想的发展规律；（3）就益处而言，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有利于克服领导集团“老化”，有利于举贤任能、广纳人才，有利于纠正官僚主义和特权观念，有利于增强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有利于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4）就弊端而言，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不利于建立高效的干部队伍，不利于选拔人才，不利于发挥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发挥社会主义民主，不利于党和国家的稳定；（5）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在中国的实际存在，究其原因，源于封建世袭制和等级制的思想残余，源于长期革命中固化的干部制度，源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源于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源于封建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6）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途径是，落实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这“三权”

① 王询：《干部职务终身制的由来》，《新闻战线》1980年第5期。

② 包心鉴：《民主的制度与制度的民主化改革——纪念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发表三十周年》，《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

并组织立法，干部制度推行招聘制、选聘制、合同制、任期制，选拔干部实行民主推荐和组织严格考核相结合的办法，以干部“四化”为方针建立良好的第三梯队，克服“论资排辈”的思想和“左”的思想的影响。^①

第三，“一国两制”问题。1982 年 1 月，邓小平第一次把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概括为“一国两制”，并且指出这不仅适用于台湾问题，也适用于香港问题。“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丰富了和平相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对当代中国政治学的重要理论贡献。虽然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就“一国两制”的内容进行了诸多明确表述，但是海外学者特别是台湾当局仍然对“一国两制”心存误解和偏见。为了在学理上进一步阐明“一国两制”的内涵和意义，政治学界对此加以诠释。针对台湾人士以“西藏事件”对“一国两制”借题发挥，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是从历史出发，论证了“西藏模式”和“一国两制”在内容上的差异和本质上的区别，进而指出“一国两制”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统一和国际争端的创造性理论。^②关于“一国两制”的科学内涵，有的学者在界定“一国两制”含义和内容（有法律保证、不同地域不同制度、有明显区别、自治地域无主权和外交权等权力）的基础上，描述了“一国两制”的基本特征（一为单一制国家结构下包含复合制元素，二为主体是社会主义），解释中国和平统一后国家结构形式的变化，指出中国可以实现和平统一的可能途径。这一

① 参见高放：《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的伟大意义》，《人文杂志》1980 年第 4 期。余伯流：《浅论废止干部职务终身制》，《求实》1980 年第 10 期。肖光明、韩在峰、赖秋萍、杨雪聘：《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 年第 4 期。宋质奎：《对职务终身制的考察》，《求实》1981 年第 1 期。赵命柱、牛银虎：《浅谈“废止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晋阳学刊》1981 年第 1 期。江山：《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干部制度的重大改革》，《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 2 期。

② 参见姚一平：《中国和平统一的实际模式——对台湾某些人士以“西藏事件”经验诋毁“一国两制”模式的分析和评论》，《政治学研究》1985 年第 3 期。

阶段中国政治学界对于“一国两制”问题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就是对“一国两制”做出“主权”和“治权”的解释。主权必然包含着治权，而治权则可以有多种并且不是均衡的，以治权为依据的体制要从属于以主权为依据的体制。“一国”就是强调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性和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两制”则是治权的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就是主权和治权的高度有机的结合。^①此外，学者们或是从历史上寻找“一国两制”的借鉴，或是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为“一国两制”寻找依据。他们不仅从国家结构形式等方面对“一国两制”加以解读，而且从“一国两制”的可行性上对其进行展望，并对将“一国两制”用以指导解决香港问题提出具体建议。^②

在政治学方法层面，20 世纪 80 年代中前期的中国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呈现出“重思想轻学术”^③的时代色彩，但是考虑到中国政治学卅载蛰伏，百废待举，而且恢复政治学之后的政治学研究者大多出身于马克思主义原理专业和科学社会主义专业，这一点也应当同情式的理解。作为方法奠基时期，当时政治学界的重要贡献是以历史—逻辑的分析方法为主导，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建构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分析中国的政治生活。同时，伴随着系统

① 参见王邦佐、王沪宁：《从“一国两制”看主权与治权的关系》，《政治学研究》1985 年第 2 期。

② 参见陈鹏生：《一国两制的历史借鉴》，《法学》1985 年第 2 期。姜烽：《试析“一国两制”战略决策的理论和实践》，《江淮论坛》1985 年第 2 期。黄昌保：《“一国两制”是具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的新形式》，《求实》1985 年第 3 期。李家泉、姚一平：《“一国两制”是统一祖国的可行途径》，《广东社会科学》1985 年第 1 期。张守谦：《香港问题和“一国两制”》，《世界经济研究》1985 年第 1 期。周毅之、施汉荣：《从香港问题看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广东社会科学》1984 年第 1 期。

③ 参见王邦佐、潘世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4 页。该书认为 1980 年代是“重思想轻学术（指琐细的论证）的时代”，并以论文注释（刚开始几乎没有，直到 1986 年才有零星几篇论文中出现注释）等为例对此进行说明。

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引入到中国，^①一些学者担当了中国政治学方法的“拓荒人”。有的学者运用系统论的逻辑来看待政治体制，视其为整体化的有机体系，通过阐述政治体系内部关系的复杂性和联系性，来强调政治体系在结构上的有序统一。^②有的学者将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引入到对政治运行的研究中，以输入——转换——输出——反馈的模式来展示政治信息在政治过程中的传递、扩散和处理。^③还有学者专门就实证方法运用于政治学进行论述，用变量（变项）之间的关系来表述行为之间的关系，推演出概念的实用化要以观察（度量）为终结，从而说明实证方法对政治学理论命题的可靠性和验证功能。^④还有一些对于西方政治学方法的引介，如比较政治学的方法，但是寥寥无几。^⑤总体上，重建初期的政治学方法中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比例失调，概念到概念、结论到结论的演绎方法占据统治地位，导致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不足。

（二）理论扩展和方法借鉴时期（1986—1989 年上半年）

政治学在中国作为独立学科全面恢复之后，更多高校陆续开设了政治学专业，政治学领域的专业刊物也逐渐增多，一些重要的政治学著作也开始进入学界的视野。但是，对于政治学的成见仍然没有完全消解，还有人把“政治课”和“政治教育”等同于“政治学”，对于

① 参见王惠岩主编：《政治学原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46—271 页。

② 参见丘晓主编：《政治学原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31—451 页。

③ 参见卢林：《政治学实证方法初探》，《政治学研究》1985 年第 3 期。

④ 从可查阅的资料来看，这一时期对西方政治学方法专门进行介绍的文章只有两篇，而且一篇是比较简单的摘译，另一篇则是对单个西方学者论文的转译。参见王秋实：《美国政治学书刊简介——罗伯特·伯恩斯坦和詹姆斯·迪厄著：〈政治学方法导论〉》，《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2 年第 9 期。[比]塞勒：《比较政治学的方法》，《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4 年第 12 期。